

从文化传播学看早期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

宇恒伟 谢仁生

(遵义医科大学, 贵州 遵义, 563006)

摘要: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也符合文化传播学的特点。从文化传播学看待早期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 具体依照功能、系统和特点三个传播层面展开, 能够更加清晰地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地域性特点。

关键词: 文化 传播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中, 细节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与之相连, 地区性、民族性、医疗史等也常常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之一。这种具体性研究的益处显而易见。就作为西南地区的贵州而言, 这里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镇, 然而其研究在遵义会议前后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早期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从 1917 至 1927 年相关资料非常稀缺, 这对于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进展造成了诸多障碍。无论是早期, 还是后来,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是前后相续的一个过程。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必将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有所提升。

一、作为文化传播史的马克思主义

文化的传播是日常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说它常见主要是因为它作为信息具有普遍性。通常, 文化是作为信息技术层面而显现的, 文化传播论也是基于信息的传播和发展而言的。从普遍意义上而言,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能量的交换。这种普遍性揭示了世界存在的普遍本质, 其渗透性体现在多个物理学概念中, 诸如熵等, 进而转换到文化传播中, 也成为展现某种事物存在状态的一种衡量指标。简言之, 文化传播论是人们用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基本概念关注文化而形成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仍有待于继续完善。文化传播论, 顾名思义, 乃是基于文化层面而言的。首先讨论的话题必须基于文化本身。

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文化传播论的研究对象呢? 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一种文化? 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 这种文化有其特殊性, 我们所要揭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点。除此之外,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 它的文化特性又是如何体现的, 其中涉及主体、客体、环境、媒介、环境、功能等范畴之中。特别是在贵州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 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或者说, 其文化意义有所延展。这都是需要关注的话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向地区倾斜的同时, 资料的积累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 细节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补充和完善资料。它从更加完整甚至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可以说,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某些方向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文化传播的马克思主义, 理应被学术界所关注, 其传播中的些许痕迹更应当被提升到更加广阔的意义。尤其是, 在某些具体领域中, 其功能未必是全貌的。从当时社会看, 马克思主义具有社会功能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具体在不同受众中, 或许其意义还有待甄别。文化传播只是我们切入问题的方法之一, 它以一种方式成为人们关注和了解社会问题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希冀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本质的了解。特别是随着不同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资料得到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挖掘,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研究有所裨益。除此之外, 以特殊的时间段为透视视角, 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亮点之一。

二、传播的功能

作为一种世界潮流,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解放和革命运动而言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极为一致的认同和回应。因此,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诸多运动层出不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民族独立为目的,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国家或者地区曾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社会效应,说到底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根本特性——无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力图将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主人,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社会。这个社会基于大多数人的平等,生产力可以达到较高程度,可以达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不可分的。1899年,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一文,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成为席卷全球的一个话语时,人们就力图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主张。几乎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作品的相关译介中,马克思主义真正走入中国社会。应当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关注、认识和推介,从根本上在于其具有的社会功能。即,首先是为了满足当时的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和拯救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主要是知识分子所宣传,进而引起社会群体的广大反响。

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社会功能可以更加具体地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席卷中国的一种运动,在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成为一种具有倡导新风尚,与旧社会决裂,力图摸索出一条新路的思想革命。这是当时国人的共同诉求。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同样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性质,先进的知识分子阶层首先意识和了解到世界的变迁,他们多是到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来,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并将之作为一生的生命追求。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性就在于,它是被一些社会群体所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些群体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甚至在某些阶段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例如,王若飞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就和周恩来一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报刊、经典著作、社论、杂论、运动等成为主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实现,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功能。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社会之中,了解物质动因,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切身的体会,积极参与无产阶级运动……建立未来的美好社会乃是无产阶级的共同愿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占社会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应有的权益。能否认识到自身面临的社会处境,能否了解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历史使命,能否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意义。千百万革命战友深受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深知生活的物质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带领下积极参加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祖籍贵州荔波的水族青年邓恩铭在1931年被反动派所杀害。类似的历史有很多,都是无产阶级为革命理想不懈奋斗的记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功能当然更直接地体现在经典著作中。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陈独秀发表《谈政治》等等,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研究性论著。曾积极撰写马克思主义论文的李侠公在上世纪30年代翻译了名著《政治经济学丛书》。虽然贵州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翻译较为落后,但是不乏马克思主义作品的传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教育,它将真实的历史进行再现,成为无产阶级了解历史真实面貌和走向自我解放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者看待问题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以历史角度辩证地看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作品都与历史相关,他们也广泛阅读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几乎所有一切优秀成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未来结果》等作品包含着马克思的很多历史观,那些间接涉及历史观的作品也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育不是直接论述历史,而是在对社会经济、政治、实践、道德、法、宗教等层面进行本质的理论总结,可以说具有典型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育落脚在当下。

三、传播的系统

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实则是马克思主义被接受的一个缩影。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早期在贵州遭遇了更加贴近现实的画面。传播可以通过多个角度得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序的，成系统性的，可以通过传播论中的系统得以体现。

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传播是非常鲜明的，即以政治传播为主。马克思恩格斯大量作品以政治类为主，因此在传播上也是以政治题材为主。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过程，源于马克思主义是叩问现实的。它以人类社会发展史为根据，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这是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的。以此，无产阶级知道了革命斗争所指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早期在贵州的传播同样也是如此。1927年，毕业于达德学校的刘映芳、李小崧、赵希云合伙开设三友书店，专门出售新书。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直接指向政治层面，向知识分子和民众传达无产阶级立场的观点和学说。政治愿景是当时中国现实困难的直接反映。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思考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权利，马克思主义作品进入贵州后，先吸引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们满腔热血，积极参加革命，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一份子。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同时也存在着向民众以及政府工作人员普及的状态。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被以作品形式纳入宣传，这是很多思想传播的共有特性。除此之外，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运动也在以新闻、见闻等形式影响着国人。不过，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仍然以知识分子为传播主体，他们有意识地在学校、革命运动、乡下进行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受众也随着扩展到民众和政府官员之中。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国外回国的知识青年，他们了解到国外新的马克思主义动态，对于国家和民族危机感触颇深。在他们看来，向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的确如此，正是在青年们热血的干劲下，思想解放首先风行。他打碎了几千年来困扰国人的思想束缚，转而从新的理论中获取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地成为很多人的选择。知识分子往往是热血青年，他们对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于新世界的变化往往充满着好奇。然而，在这之外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落地到中国实际之中。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步放弃了原有的空想和幻想，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才找到了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知识分子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们在无产阶级运动中逐步占据了革命的领导地位，而只有真正实事求是从中国大地成长的才能成为革命领袖。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有其特殊的受众和人文环境。从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受众就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有志于革命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仅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书生，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存亡，甚至民间疾苦，对老百姓抱有很深的感情。这是远远不同于以前社会的。新的社会风貌在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下，社会新风不断涌现，旧的社会风气被摒弃，很多人愿意接受新世界的良好风尚，他们对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共同富裕等有着共同的理想。这些看似具有理想化的信仰，实际上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特点。“少年贵州会是贵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民主与科学之风，希望挽救民族危亡的产物之一。”^[2]民众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受众对象。这种情形能从很多很多资料中看到。例如，周祎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及初步大众化》中举例说：“他们身在他乡心系桑梓，通过种种方式和不同渠道，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回家乡，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做出贡献。”^[3]潜移默化中，民众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受众逐步扩大，并和全国其他省区一同成为燎原之势。贵州当时不仅面临民族危机，而且受到军阀的严酷剥削，民族地区又伸手民族之苦，因此矛盾更加突出。贵州籍的先进分子急需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他们首先从观念上进行改变。有幸的是，相较于其他地区，贵州的传统文化力量相对薄弱，在现实面前民众容易改变思想观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滋养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一道成为新思

想的传播者和参与者。

四、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具有传播论的特点，在媒介、模式、类型上具有突出的特征。传播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其回应、互动、交流和碰撞在文化传播中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的媒介主要以口语和文字为主；模式上具有系统性和分散性兼具的特点；类型上则以人际传播为主。民众传播则局限于失业工人、知识分子、学生，组织还没有建立。

文化的早期传播大致具有很多共同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也不例外。借助于订阅报刊、翻译著作、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参加运动，这都是当时的常用方式。这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相对应。因为一种学说进入他国或者地区的开始，往往伴随着初步的认知。因此，有些学者将此作为不同阶段进行划分。比如，田子渝在《略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三个问题》中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自发、自觉；有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阶段。^[4]不管三个阶段的说法是否合适，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特点的确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在于联通不同人群的交流，通过口传，主要是宣讲和说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以及基本观点，这是非常显著的方式。通过文字，主要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基础，对于知识分子寻求真理，以及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指导是非常有必要的。围绕文字内容，先进的革命志士还写观感、总结等，以此对广大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媒介只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夹杂着传播主体的灵动。一般而言，先进的有志青年在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时，有时候是借助于国外翻译而来的作品进行重译后引入中国，有些则是他们根据自身认识进行选择的结果，这就很容易造成传播过程中的碎片化。不过，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学说和革命运动，它具有的无产阶级辩护和对抗资本主义的立场几乎没有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可能弱化了某些具体问题，但是大致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这对于当时的国人已经足够了。有些民众相互之间进行传播则是无意识的，他们不懂得理论问题，但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极为有限的了解中，或者从个别革命人士的举动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具有新思想，他们对此也是理解的。

在模式上，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兼具系统性和分散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系统性源于20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完整，国内学者不断引进或者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撰写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在传播基本观点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革命烈士周逸群（1898-1931年），20年代曾与李侠公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宣传新文化和革命主张，所撰写的诗歌《工农、世界主人翁》等，唤醒民众，反抗压迫和剥削。中共思南地下党负责人肖次瞻（1905~1940年），在黔东北开展革命活动，曾在思南中学《駉駉》等刊物上发表许多短文，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这种系统性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不可能系统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也就具有了分散性的特点。“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的强烈的冲击感是适应新时代的，它的基本精神可以在很多著作中的会呈现出来。分散性通过细节得以体现，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的一种方式，有助于迅速认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在各自工作岗位、不同地区书写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者个体通过报刊、工人等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在缺少马克思主义作品认知的情形下，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靠的是理想信念，靠的是深藏于内心的力图改变命运的信仰精神。

人际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类型，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样，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主要传播对象。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确切认知，口头成为人们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人和人之间的对话主要依赖于占主导一方的宣传，而对话的另一方则比较被动地接受。人际传播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是人们获取信息，进行学习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很多缺陷。第一，限于相对熟悉的人之间进行交流，因此师生、同乡、朋友就是比较经常的关系。这些并不是稳固的，在这种对话中有些人的一直不坚定，另一方就可能面临危机。历史

上很多事例都能说明这一点。第二,人际传播反馈的信息时效性差,对于他国或者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多好奇和羡慕,对其过程和实质能以了解,随着革命的不断进行,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说到底,人际传播是基于感情纽带为主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固定在这种基础上。作为一种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者前仆后继也大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思想上,但是很多争议问题没有得到认识。革命仍然停留在初步阶段。

传播策略以基于对现实困难的认知为基础,进而向所有群体开放,后来逐渐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这时候,组织只是初显。1928年贵州的党组织才开始成立,其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步进入有序化和组织性的层面。在此之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欧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阶段,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但是一些报刊、读物不断进入留学生的视野,他们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学说一样,这些人感同身受,在民间危机和国家危难时刻,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解放的道路。这在当时广为认可,毕竟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切身体会到军阀割据、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境况。对此,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受众以学校、特别是大学和军校,而后逐步走向广阔的社会。根据《民国初期黔籍留学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载,留学生回国后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武装工农群众,夯实了阶级基础。这些阶级主要有:贵州青年、青年军人、工农群众。^[6]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组织性主要依赖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的联系,这种方式不是党组织形式,只是依赖于日常交往纽带而形成的联系方式。

参考文献

- [1] 姜秀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N].光明日报,2018-07-18.
- [2] 陈旻旻.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研究[D].广西大学,2018:20.
- [3] 周祎.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及初步大众化[J].法治博览,2015(11):273.
- [4] 田子渝.略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三个问题[J].决策与信息,2016(07):10.
- [5] 董扣艳,傅德华.民国初期黔籍留学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04):23.

The spread of early Marxism in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Yu Hengwei Xie Rensheng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Zunyi/ Guizhou, 563006)

Abstract: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lso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think about the spread of early Marxism in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t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three communication levels of function,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overal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Keywords: culture, communication, Marxism

作者简介: 谢仁生,男,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文献搜集与研究”(编号:19GZYB48)。